

Study the History of Mandarin On the Base of *Lǎo Qǐdà*¹

Histoire du mandarin d'après *Laoqida*²

從《老乞大》看漢語官話史

Zhang Weidong

張衛東

Received 17 March 2005 ; accepted 29 March 2005

Abstract Is it true that the Beijing dialect was Mandarin within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4th century)? Were the Interpreter Piao (《樸通事》, Piáo Tōngshì) and the *Lǎo Qǐdà* (《老乞大》, *Lǎo Qǐdà*) written in the Beijing colloquial language? Whether had the College of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正音書院, Zhèngyīn Shūyuàn) within the period of King Yongzheng of the Qing dynasty (1723-1735) given an impulse to shape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All of these questions mentioned before not only are the key tasks, which have deal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modern times; but also are the unavoidable questions in research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the popular, or the so-called “mainstream” of current opinion looks logical and well argued, but it is specious. Pronunciation is the main basis for estimating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The Beijing pronunciation (Northern Mandarin) was not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 of the modern times; the representative was Nanjing pronunciation (Southern Mandarin). The Interpreter Piao and *Lǎo Qǐdà* were not written in the Beijing colloquial language. And the College of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did not give an impulse to shape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on the opposite, it delayed the process of shaping.

Keywords: Mandarin, Beijing dialect, Nanjing pronunciation, the standard and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the Old China

Résumé Le mandarin est-il représenté par le dialecte de Pékin au quatorzième siècle ? Putongshi et Laoqida sont-ils écrits en dialecte de Pékin ? “L'école de ton orthodoxe ” dans la dynastie de Tsing a-t-elle promu la formation du langage commun de nationalité Han d'aujourd'hui ? Voilà les questions cl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u mandarin contemporain et moderne que les manuels de la langue chinoise moderne ne peuvent pas éluder . Pourtant , le point de vue majeur ou plutôt populaire , est faux malgré son apparence bien raisonnable . Les sons du langage est la critère principale pour définir la nature languagière des documents anciens . Le symbole de ton orthodoxe du mandarin contemporain n'est effectivement pas le ton de Pékin , mais le ton de Nankin . En Corée , les manuels de chinois Putongshi et Laoqida ne sont pas rédigés en dialecte de Pékin . “L'école de ton orthodoxe ” dans la dynastie de Tsing n'a pratiquement pas promu le processus de formation du langage commun de nationalité Han d'aujourd'hui , mais bien au contraire , elle a retardé ce processus .

Mots-clés: mandarin , langage de Pékin , ton de Nankin , ton orthodoxe et ton populaire, Laoqida

¹本文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老乞大〉多版本語言學比較研究》(批准號 02BYY029) 資助。

²曾刊於《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5 年 5 月 , Volume 1 , Number 1 。因排版造成部分錯誤 , 特再次刊出。

摘要 元末明初漢語官話“以北京話為代表”？《樸通事》和《老乞大》“是用北京口語寫的”？清雍正朝的“正音書院”推動了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這是涉及近現代漢語史的關鍵問題，也是現代漢語教材不能回避的問題。然而流行的或曰“主流”觀點，看似頭頭是道，實則似是而非。判斷古文獻語言性質的依據主要是語音。近代漢語官話正音的代表，並非北方官話的北京音，而是南方官話的南京音；朝鮮漢語課本《樸通事》和《老乞大》不“是用北京口語寫的”；清雍正朝的“正音書院”並未推動，反而延緩了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形成的進程。

關鍵詞：官話；北京話；南京音；正俗音；《老乞大》

邵敬敏主編的《現代漢語通論》之《現代漢語概述》述及“現代漢語的歷史來源”時說：

在白話文學流傳的同時，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官話”也逐步傳播開去，不僅成為各級官府的交際語言，而且逐漸變成各方言區之間的共同的交際工具。元末明初的《樸通事》和《老乞大》是兩種供朝鮮人學習漢語用的會話課本，就是用北京口語寫的，被公認為當時漢語口語的代表。清朝的時候，在福建、廣東等地設立“正音書院”，教授官話，並且規定不會官話的人不能做官。這樣，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就成了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口頭形式的源頭。（邵敬敏：3）

這樣的概述，幾乎見於所有《現代漢語》課本，涉及近代漢語史上的多個關鍵問題：

(1) 元末明初漢語官話“以北京話為代表”？

(2) 《樸通事》和《老乞大》“是用北京口語寫的”？

(3) 清雍正朝的“正音書院”推動了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

在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老乞大》多版本語言學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時遭遇上述問題。為了推進討論，從現存最早的《元刊本老乞大》到最晚的《重刊老乞大諺解》共 12 個版本（5 個全漢文本，7 個諺解本），我們全部錄入電腦，形成“多版本檢索統計系統”，以輔助語音、辭彙、語法研究。涉及漢語史的問題，語言三大要素中，語音的比較研究最具廓清歷史真相的力量。為此，每個諺解本，都建有“語音檢索統計資料庫”：分左音、右音；每個音節又分：音節、聲母、韻母，韻母再分韻頭、韻腹、韻尾。該系統既可分項檢索、統計，又可以綜合檢索、統計，既利於量化分析，又便於不同版本的比較分析。

在《老乞大》多版本語言學比較研究資料庫裏，左右音俱全的六種《老乞大》諺解本，代號

分別是：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九、老 A、老 B：

版本	代號	刊行年代
《翻譯老乞大》	老四	1517 年
《聯經本老乞大諺解》	老五	1670 年
《老乞大諺解》	老六	1745 年
《舊刊老乞大諺解》	老七	1745 年
《老乞大新釋諺解》	老九	1761 年~1763 年
《重刊老乞大諺解》	老 A	1795 年
《存羊本老乞大》	老 B	？

刊行年代，主要參見林東錫《朝鮮譯學考》（林東錫：351-363）。

老九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尋得。老 B 是老九所據的“古本”，附于老九中，序雲“蓋存羊之意也”，我們即謂之“存羊本”。其刊行年代尚未確定，且僅存右音，本文暫不予討論。

限於技術條件，諺文（韓文）字母，在《老乞大多版本語言學比較研究》資料庫內使用了一對一的語音代碼，本文仍之。

1. 元末明初漢語官話 “以北京話為代表”？

《老乞大》《樸通事》這一系列朝鮮漢語教材，忠實地保存了近代漢語官話的風貌。“元末明初”諺文尚未創制。第一個諺解本是明代中葉崔世珍所作《翻譯老乞大》（1517）。由其聲、韻、調系統可以斷定：其所記所教的不是北京話而是南京話，換言之，那時作為通語的標準官話不是北方官話的代表北京話，而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南京話。

1.1 《老四》左音聲母 (26):

b (幫) p (滂) bb (並) m (明)
 f (非敷) ff (奉) w (微)
 d (端) t (透) dd (定) n (泥疑) l (來)
 z (精知章莊) c (清徹昌初) zz (從澄禪崇船)
 s (心書生) ss (禪邪船崇) r (日)
 g (見) k (溪) gg (羣) ng (疑雲) h (曉)
 hh (匣) o (影) 0 (以雲匣疑)

《老四》之後的其餘五種版本，左音聲母也都是 26 個，共同特點是：

(1) 成套地保留中古全濁聲母。而代表北音（北方官話）的韻書，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1324），中古全濁聲母已然清化；而代表南音（南方官話）的《洪武正韻》（1375）、《中州音韻》（1503），分別晚于《中原音韻》52 年、179 年，甚至清康熙年間問世的《詩詞通韻》（1685），都還成套地保留著中古全濁聲母。

(2) 精、知、章、莊等四組聲母用一套記音符號：z（精知章莊）c（清徹昌初）zz（從澄禪崇船）s（心書生）ss（禪邪船崇）。

(3) 見組細音不齶化，仍讀舌根音。

(4) 有後鼻音聲母 ng，且自老七始大量增加。

(5) 影母 o 跟來自雲、以、匣、疑諸母的零聲母 0 不混。

以上皆為南音（南方官話）聲母的特徵。

1.2 《老四》右音聲母 (17):

b p m f w d t n l
 g k h z c s r 0

《老四》之後的其餘五種諺解本，右音聲母都是 16 個，比《老四》少一個 w（微）。其共同特點是：

(1) 中古全濁聲母全部清化，濁平變為送氣清音，濁上、去變為不送氣清音。

(2) 老九、老 A 少量見組細音字記音與精組細音相同，³如“京既講起欺教家去求舊虛喜許”；許多常用字聲母仍是舌根音，如“今見價近舅下學行兄”；跟反映北音的 1743 年的《圓音

³膠遼方言文（登）榮（成）話中古見組細音有文白異讀，文讀聲母為舌根音，白讀聲母為舌尖音、讀同精組。請參見拙文《論文（登）榮（成）方言中古見組字讀同精組》，語言學論叢第十二輯（1984），36-49 頁。老九、老 A 表像與此相同，屬什麼性質尚待研究。

正考》“不但齊撮呼的見溪群曉匣已經變了□，□□，□，連精清從心邪也變為□，□□，□了”（王力上冊：124）顯然不同。

(3) 精知章莊四組聲母仍用一套舌尖音 z、c、s 標記，沒有舌尖後音 t□，t□‘，□。

(4) 影母並於零聲母，俱記為 0。

(5) 日母“兒耳二”在老四至老七中皆記為 r-，直到老九（1761-1763 年）、老 A（1795 年）方變為零聲母 0。北音的這一變化要早許多，公認為北音代表的徐孝《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2）已將“爾二而”等字列於影母（零聲母）之下，比《老乞大》早一個半世紀。

《老乞大》右音聲母系統，看上去儘管跟同時代的北音乃至今天普通話聲母系統很接近，卻不能輕率地判為“北方官話”、“北京話”——各聲母領字情況往往大有差異。《老乞大》的右音系統跟左音系統，是同一音系內部相配的正、俗兩套音，即今所謂“文白異讀”。

1.3 《老乞大》的韻母系統：

各版本的左音和右音，都有所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毋庸置疑。請看各版本左右音韻母數量比較（入聲韻屬左音）：

	老四	老五	老六	老七	老九	老 A
左韻	58	61	60	64	63	64
右韻	44	46	46	46	46	47
入聲韻	18	16	16	16	14	16

明末《西儒耳目資》韻母 59 個，拙文《論〈西儒耳目資〉的記音性質》曾予討論（張衛東：1990）。何九盈評曰：“張衛東說：‘這樣一個龐大的韻母系統，在今天官話區裏，只有江淮官話才跟它較為接近。韻母超過 40 的方言，集中在江淮地區：合肥 41 個，揚州 47 個，南京 53 個。’這個意見值得重視。”（何九盈：249）諺解《老乞大》的韻母數量之大，更甚於《西儒耳目資》，特別是有著穩定的入聲韻母系統，更符合江淮官話的語音特點。今天我們也這樣看：有著如此龐大韻母系統的《老乞大》——只能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南方官話，而不可能是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

1.4 《老乞大》的聲調系統：

七個諺解本，只有《老四》即《翻譯老乞大》以加點的方式顯示聲調，跟中古四聲比較，平分陰陽，濁上歸去，保留入聲；左音五個聲調，右音六個聲調（入聲一分為二）。這與代表南京官話的《西儒耳目資》（1625年）的聲調系統乃至今天南京話的聲調系統相一致。所以說，即從聲調上看，在今北方方言區，與《老乞大》相近的，也只有江淮官話、南京話，而不是北京話。

2. 為什麼說近代漢語的代表

是南京話？

2.1 元末明初漢語官話的代表點不是北京，那是哪里呢？是南京。不僅元末明初漢語官話的代表是南京話，上至南朝，下至晚清 1850 年前後，南京話一直是通行全國的雅言通語。對此，我們已經發表過一些意見。2003 年，李葆嘉的《中國語言文化史》更有精要到位的論述：

南京方言，在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晉室南遷後，洛陽語音移至江東，經過 200 多年交融，形成的源于洛陽晉音、而在江南得到發展的中古金陵音系。當時的建康話成為南朝通語。

《切韻》一書即以此音系為主要標準，至唐代稱之為“吳音”。南宋建炎年間，又有大批汴洛人士流寓建康，從而形成了新的源于中原汴洛宋音、在江淮得以發展的近古金陵音系。

明代初年，朱元璋詔修《洪武正韻》即以當時的南京語音為主體，並以此成為官話的基礎音系。……宋代的話本、元代的戲曲、明代的小說、清代的評話，這些與百姓憂樂相與共的市民文藝，對官話的提煉、流行和傳播起著巨大作用。……

“官話”本來專指南京音，以江淮方言為基礎。……金尼閣把利瑪竇《中國劄記》中的原文“地道的中國語”改為“純粹的南京話”，證明南京話就是當時標準語官話。不僅明代官話以南京話為標準，清代官話也以南京話為標準。日本江戶時代的中國語稱為“唐話”，一般說來，“唐話”即指南京話。日本唐話教課書《小孩子》說：“官話是通行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的。”明治初期繼承了江戶時代的南京話教育而稱為“支那南京音”，明治九年（1876年）才確定把以往學

習對象“南京語”改為“北京語”。……（李葆嘉：499-500）

2.2 張屏生介紹德國人 Hemeling 1907 年所編《南京官話》時，引用了該書《序言》中有關南京官話歷史來源的一段話，亦可令人頓開茅塞：

南京官話在南京作為中華帝國的首都時，相對其他官話而言，無疑地占了優勢，在西元 1421 年永樂遷都北京以後也保持了一段時日，不過在百年之間逐漸失勢。它所得到的致命一擊來自於大屠殺，它幾乎滅絕了不幸的南京居民，一次是落入太平反叛者手中的 1853 至 1864……更糟的一次是在皇軍重奪政權的時候。小部分死裏逃生的舊居戶無法承受這些由於叛亂的鎮壓來自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移民的湧入，他們素有的標準發音沒能貫徹整個都市，甚至在今天，能夠說一口純正及地道的南京官話的居民偏少。光輝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南京官話不再是北京官話的至高權力的勁敵：後者因為方音的淨化，是目前唯一受到整個帝國承認的會話語言，這點不足為奇……德國的漢學家們已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遲至 1881 年 Von Der Gabelentz 在他的巨著《中國文法》裏不願承認北京官話在實踐上的勝利的當兒，稱其為“科學所不應跟隨的潮流”。他推薦採納 17 及 18 世紀時候耶穌會筆下所再現的、他認為是屬於南京的官話方言，以達到科學的目的。不過 Arendt 卻相信它大體上是一種舊式的官話方言。據我所知，Arendt 是首位北京方言至高權威的德籍擁護者……不過，儘管如此，南京官話保留了超越於其他官話的一定優勢，因為在某些方面它較純正及一貫的保存了漢語古音。同樣的原因，它和較其他官話方言更忠實地保留古音的中國中部沿海一帶及南方的口語方言有著更密切的關係，使它構成了一條連接南部同北部和西部方言的鏈環，從而具備了較之其他語言更廣泛地被理解應用的必要條件。（張屏生：2002）

這段話帶有“歷史見證”的性質，有幾點值得注意：

2.2.1 對南京話作為官話標準音優勢地位的“致命一擊”，是太平天國時期的“南京屠城”，打那以後，“光輝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其時即 1853 至 1864 年。此前我們根據威妥瑪《語言自邇集》所提供的資訊，推斷北京音取代南京

音成為官話標準音的時間為“1850年前後”，德國漢學家 Hemeling 為我們提出的時間及其歷史背景更為具體明確。

2.2.2 北京話獲得“至高權威”並取代南京話標準音地位，有其自身的歷史、社會等多方面的條件。順治登基前，曾用三天時間將北京城內明朝遺民全數遷至城外，城裏住的完全是東北下來的滿蒙漢八旗，從而切斷了北京話的歷史傳承關係，逐漸形成了被南方漢人譏為“胡言胡語的京腔”。這種新北京話，不可能憑藉政治權力短期內獲得天下認可，對於一個“以夷制華”的政權來說便更其困難，但在統治階層，北京話的地位是逐漸上升的。Hemeling 所說的南京話“百年之間逐漸失勢”，當指這一階段。到鹹同年間，清朝建都北京已有 200 年，國家的政治中心和社會的文化中心已然坐穩於北京。太平天國被滅、南京被毀（1864 年），北京話的地位終於獲得壓倒優勢，但“南京官話保留了超越於其他官話的一定優勢，因為在某些方面它較純正及一貫的保存了漢語古音”，因為它跟其他南方官話“有著更密切的關係，使它構成了一條連接南部同北部和西部方言的鏈環，從而具備了較之其他語言更廣泛地被理解應用的必要條件”。

2.2.3 北京話獲得“至高權威”並取代南京話標準音地位，亦有其語言方面的條件，這就是 Hemeling 所說的“後者因為方音的淨化，是目前唯一受到整個帝國承認的會話語言”。此前，支持威妥瑪、對漢語方言最有研究的英籍漢學家埃德金斯(Mr. Edkins)已發表過相同的觀點：他“把官話分為三個主要系統：南方官話，北方官話和西部官話，他以南京、北京和成都(四川省省會)，分別代表各個官話系統的標準。他認為南京話通行範圍比北京話更大，儘管後者更為時髦；可是他又承認‘那些想說帝國宮廷語言的人一定要學習北京話，而淨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話，就是公認的“帝國官話”’”(威妥瑪：5)。方音、土音的“淨化”，就是向正音的回歸。正音跟方音、土音、俗音共處於同一語言體，既互相依存又相互較量，“鬥爭”此起彼伏，有時還有反復、正俗異位。威妥瑪的北京話《異讀字音表》和諺解《老乞大》的左音（正音）右音（俗音），都為我們提供了瞭解“文白異讀語音史”的豐富資料和

資訊。（張衛東：2002）

2.2.4 認識歷史，有時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有些歷史性的變化，哪怕時過不久，哪怕是置身其中，也有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也有不願承認的。Hemeling 所說“遲至 1881 年 Von Der Gabelentz 在他的巨著《中國文法》裏不願承認北京官話在實踐上的勝利的當兒，稱其為科學所不應跟隨的潮流。他推薦採納 17 及 18 世紀時候耶穌會筆下所再現的、他認為是屬於南京的官話方言，以達到科學的目的”，就是一個例子。

威妥瑪在 1867 年推出其《語言自邇集》第一版——世界上第一部以北京官話為目的語的教學課本——之後，也遭到老一輩歐洲漢學家們的譏諷，說他搞的是“公使館漢語”。威妥瑪在第一版序言中這樣介紹當時的爭論：“那時沒有人把北京話作為寫作對象，而各種表音法都聲稱描寫的是南方官話（the southern mandarin）——諸如莫里遜博士（dr. Morrison），即第一部英漢辭典的編纂者，麥赫斯特博士（Dr. Medhurst）”和威廉姆斯博士（Dr. Wells Williams）等人——他們對於本地話系統的描寫，遠不是無懈可擊的。對於莫里遜表音法，有人主張把它看作官話表音法，埃德金斯先生根本否定任何這類主張。他說：‘莫里遜正在編撰他的很有價值的音節辭典（syllabic dictionary），卻沒有意識到他所列的音根本不是官話音，而是已經廢棄不用的發音。’麥赫斯特博士做了一些修訂以求完善的表音法，幾乎是莫里遜博士表音法的翻版；他辯解說，我沒把它當作最好的，卻因為它是最知名的。”（威妥瑪：5）

這些老一輩漢學家多是搞了一輩子南京話研究的，臨了兒卻要承認那都是“已經廢棄不用的”，豈不是把自己全否了？以這種心態是無法面對歷史與真相的。真正的學者絕不會抱這種心態，他們唯真是求，光明磊落，他們擁有的真知灼見就越多。2000 年 10 月胡明揚先生在《舊本〈老乞大〉序》中談到自己以往的研究時間開誠佈公地說：“我過去曾誤以為北京口語，非是。”此語出自中國最早作《老乞大》研究的權威學者之口，其心胸，其氣度，其品格，其學問，讓人衷心敬佩，話也因而更具份量。

3. 《老乞大》“是用北京口語寫的”

嗎？

3.1 用漢字寫出來的東西，單憑字面，很難斷定是屬於哪個方言的，《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曾被許多省份的評論者“拉為老鄉”，所依據的便是從書中搜尋到還“活”在本鄉的一些詞語。若論《老乞大》用的是北京話還是南京話，唯有語音方為可靠論據。

3.2 “元末明初的《老乞大》”，應指元刊本（老一）、華語本（老二）、侍講院本（老三）。都是非諺解的。老四即《翻譯老乞大》是明中葉（1517）的。從老五到老A都是清代的，其中也有全漢文的：老八和老十。老B即《存羊本老乞大》暫排第十二。老一等非諺解全漢文本，沒有標音，從行文上進行比較，無法直接判斷其方言屬性。例如：

老一：恁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有？俺漢兒人上學文書來的上頭，些小漢兒言語省的有。

老二：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小漢兒言語省的。

老三：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小漢兒言語省的。

老四：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少漢兒言語省的。

老五：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少漢兒言語省的。

老六：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少漢兒言語省的。

老七：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少漢兒言語省的。

老八：你卻是朝鮮人，怎麼能說我們的官話呢？我在中國人根前學書來著，所以，些須知道官話。

老九：你卻是朝鮮人，怎麼能說我們的官話呢？我在中國人根前學書來著，所以，些須知道官話。

老十：你卻是朝鮮人，怎麼能說我們的官話？我在中國人根前學書來，所以，些須知道官話。

老A：你卻是朝鮮人，怎麼能說我們的官話？我在中國人根前學書來，所以，些須知道官話。

老B：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少漢兒言語省的。

這是高麗/朝鮮商人跟好奇的中國人之間的

一段對話。比較的結果是，老一帶有明顯的元朝漢語特徵，如句末語氣詞“有”，第一人稱代詞“俺”，第二人稱代詞“恁”；老二至老六，行文完全相同，沒有了元朝話特徵；到老八，進入朝鮮時代，自稱“朝鮮人”不說“高麗人”了，稱“官話”而非“漢兒言語”了，因果連詞“因此上”變為“所以”，表數量的“些小/些少”改說“些須”，語氣副詞“卻”的位置變了，疑問句式也變了；老八、老九還出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語氣詞“呢”和“來著”，老十、老A又沒了。

3.3 我們已經從語音上判定 1517 年的老四即《翻譯老乞大》及此後所有諺解《老乞大》用的是南京話而不是北京話。而行文上，老二三跟老四五六七完全相同，因而可以認定，全漢文本的老二三跟諺解本同屬一個語言體系；老二至老七、老八至老A這兩組的差異，屬同一語言體系的歷史演進（老八跟老九是同一漢文底本，但行文遣詞小有差異）。再加上我們對近代漢語史標準音背景的瞭解，可以進一步肯定：無論諺解本還是漢文本，它們（包括“元末明初”的三個版本）用的都是南京話而不是北京話。

4. 清雍正朝的“正音書院”推動了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

4.1 有個民間故事，說的是雍正皇帝坐上了金鑾殿，福建省送來貢品荔枝。雍正沒吃過，問在朝的福建籍大臣：“有核兒沒核兒？”回答說：“有。”但皇上聽成“無”，便放心地一口咬下去，“哎喲！”門牙被一個硬硬的東西硌得生疼！急忙吐出一看，一個烏黑發亮的硬核兒！這簡直是欺君之罪！責問道：“明明有核兒，為什麼說沒有！”這時，那位大臣真是白長了一張嘴——有口說不清！

這位大臣“倒楣”在哪兒呢？就是不會說官話，說“有”用的是閩方言口語音：

方言	有	無
廈門	[ɿ]	[ʨ̚]
潮州	[ɿ]	[ʨ̚]
福州	[o]	[ɸ]

*采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

廈門和潮州話說“有”音[ɿ]，外地人聽著就是“無”；福州的[ɔ]，雖說略有不同，但只是從7號母音向8號母音的一個小小的移動，外地人稍不注意，聽著跟[ɿ]也差不多。所以，這位福建籍大臣，不論他是閩南的還是閩東的，只要說“有”，外地人聽著就是“無”！雍正因此而責令閩粵人學官話正音，學不好不能做官。

這則故事，編進了電視劇《雍正王朝》，不過那裏的官兒是廣東潮州籍巡撫。

4.2 最近看到一些教材、論文、學術著作以及網站都提及雍正“官話正音”訓諭事，例如：邵敬敏主編《現代漢語通論》(第3頁)，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編《現代漢語專題教程》(第4-5頁)，王理嘉著《中文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第8頁)。論者皆作正面評價。以上皆本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1934)；而黎先生所引雍正訓諭，則出自《大清世宗皇帝實錄》卷七十二。

從雍正訓諭“屢經指摘訓飭”一語看，清廷對於“官員不通官話”早有不滿，雍正的不滿倒是出以公心：“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語言使人共曉，然後通達民情，而辦理無誤。”他有具體而痛切的感受：“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奏陳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戶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考慮到“語言是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於是頒令：在閩粵由地方官訓導，遍設正音書館。次年，閩粵台各地便開設了一大批“正音書院”“正音蒙館”，僅福州城內便設了四個。徐珂《清稗類抄》(二)亦載：“閩中郡縣，皆有正音書院，即為教授官音之地”。

4.3 此事始則“大張旗鼓”，繼則“虎頭蛇尾”，其意義與作用不宜過分誇大。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裏有一段話(轉引自《陳望道文集》第三卷第107頁)：

雍正六年(1728)，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1735)，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1737)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

乾隆十年正音書館被裁，這是因為“大功告成”還是“半途而廢”？看來是後者，雍正的辦法大約無效，乾隆一上臺便“弛其令”，到1745年乾脆撤銷。各地相類。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1974)說：“雍正七年(1729)……臺灣縣署(今台南市)設立過短命而終的正音書院，……後來在鳳山、彰化、諸羅也先後設立短命的正音書院”。

4.4 “虎頭蛇尾”的原因何在？從語言教學的專業角度看，有如下問題：第一，名曰“正音”，但何為“正音”？是南京音還是北京音？“訓諭”並不明確，各地正音書院便無所適從；第二，沒有培訓、配備合格師資。有資料顯示，福州四書院開課皆臨時邀守城旗人來作教習；第三，沒有教材，沒有官方課本。守城旗人來上課，開首幾句話(“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當時即落為笑柄。這樣的教學，當然難以為繼；第四，漢人對旗人的燕京音普遍反感——這種語言心理可能更為致命。(張衛東1998B)

4.5 然而，對於強化社會正音意識，此事肯定發生過不小的影響。到雍正七年，清朝定都北京已有85年，受旗人滿語影響的北京話，儘管一直遭到南方人的普遍鄙視與抵制，然而對東北(尤其是黑龍江)、華北的北方官話區已有一定影響，傳統官話正音代表——南京話的地位有所動搖，正音代表點已有北移趨勢。這是社會無意識的一種自然形態的變化。如果不發生特殊情況，這種變化會一直悄然前行。但是，經雍正這麼一“訓諭”，仿佛給這無意識的社會提了個醒：正音！正音！我們的“正音”……傳統的力量是巨大的。朝野上下硬把雍正“訓諭”悟成“趕緊回到南京話——標準的官話正音上去！”特別是那些“南官北用”的漢員，把北京話斥為“胡言胡語的京腔”或“老媽子的話”的漢人(乾隆末年形

成的京劇，其韻白、京白之角色分配，即反映了這種社會心理與語言現實），多會借機大舉鞏固、提升南京官話正音的地位。這樣一來，北京話地位上升的進程大為延緩，成為官話標準音的時間就推遲了百餘年。當時若明確規定“以北京音為正音標準”，結果可能大不相同。可是雍正沒這麼做，也就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所以不能誇大他的作用。康熙末年李光地、王蘭生受命編纂的韻書《音韻闡微》，于雍正四年完稿。這部韻書雖然使用了康熙宣導的“合聲法”（即滿文拼音法）改良反切，但從它有平上去入四聲和保留入聲韻可以判定：它絕不是北京音。也許，康乾雍所倡之正音，本來就不是當時的北京音。

4.6 音節資料庫顯示老六、老七之間的左音相似度陡然下降：老六共有不重複資料 541 條；⁴老七共有不重複資料 597 條；老六有而老七無者，共 76 條；老七有而老六無者，共 132 條；二相者同的共 465 條，占 81.72%；二者不同的共 208 條，占 18.28%。諺解六版本，前三個版本左音相同率為 96.96~99.44%，後三個版本左音相同率為 95.23% 上下，前後兩組，具體地講在老六和老七之間，二相者同率僅為 81.72%，相異率為 18.28%，高於各組別內部不同版本之間相異率的數倍甚至數十倍！說發生了某種“突變”、出現一條“斷裂帶”，實非誇張。

4.6.1 請先看韻母的變異。（見文末《表 4.6.1：韻母的變異》）

4.6.2 老五與老六之間的各項變化，在老六與老七之間繼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逆向突變”：

(1) 鹹深二攝收-m 尾的字，老六只有 5 條，而老七陡增為 67 條：鹹攝 73 字，收收-m 尾的 46 字，收- ω 尾的 27 字；深攝 35 字，收-m 尾的 22 字，收- ω 尾的 13 字；就是說，咸深二攝陽聲韻字全數收-m 尾。老六鹹深二攝字跟老七同樣多，收- ω 尾的字數相同，但收-m 尾僅 5 字；“臉”在老四五六中都讀-ien，一到老七便是-iem。

(2) 中古部分合口韻，老六已變為開口、與今音相近，如蟹攝“杯背梅”、止攝“饋(給)”、

山攝“般盤滿”、臻攝“本噴門粉文問”等字，老七卻“復古”為合口韻；此外，山攝“蕃飯乏襪”等字，老七也近乎合口化。宕江二攝知莊組字，如宕攝“裝粧壯”、江攝“撞雙”等，老六已近乎合口、與今音相近(oang)，老七卻“復古”為開口韻(ang，今僅見于部分吳語、老湘語)。

(3) 通攝字無論一等三等，老六除見系少數字之外，均為合口-ung、-u ω ；而老七的三等字除了非組之外，全數讀為齊齒的-ivng、-iv ω ，並牽連了少量一等字如“籠瓏鬆”，此等讀法今尚見於濟南、膠遼方言的文白異讀。

(4) 老七的蟹攝開口二等“捱皆塔街解芥界芥薤械”等字讀-iai、開口三四等“例滯迷米抵底”以及止攝“地你李既氣季”等字由老六的-i 變為-iei，果攝“大他那阿麼”的韻母，也都帶逆向異變性質。

(5) 止攝老六開口- \ddot{u} 韻字，老七變回齊齒的-i 韻（“齒兒耳二餌時匙柿事是侍市枝”等字）和-i 韻（“痞被鞞鞞”等字）。

(6) 老七出現前所未有的 7 個新韻母：-iew 韻（效開三宵開四蕭：叫擾條橋澆燒矯朝糶繳聊了腴瓢鞘少消小笑腰搖調照趙苕遼貂）、-iai（蟹開二皆佳見系：捱皆塔街解芥界芥薤械）、-iam 韻（鹹開二鹹銜韻：減嵌鑑鎔）、-ian 韻（山開二山剛見系：姦揀艱限眼鋼閑間雁）、- \ddot{u} ing 韻（曾開一登梗開二庚耕：棚朋燈等鐙甌能層曾冷爭庚更梗肯甥生孟）、-uing 韻（梗合二庚：橫）、-iving 韻（梗合三庚清：營兄永）。它們分別從老四五六的-ia ω 、-iei、-ien、- \ddot{u} ng、-ung、-ivng 諸韻分化，而分化這種分化，也是逆向異變性質的。

(7) 曾攝“肯”字前三版本已變同今音 k \ddot{u} n，老七以後卻變回後鼻音韻 k \ddot{u} ing。

4.6.3 跟韻母情況不同，聲母系統前三個版本跟後三個版本相同，不存在系統變異。以

老七為界，前後不規則的對應是零星的；較為顯眼的只有：

(1) 中古全濁的“辦糶蕃件饋蕪”等字，老六標清，老七標濁；也有相反的，如“別裙”等字；

(2) 中古疑母字聲母，老六多數讀零聲母(0-)，老七則大量變回後鼻音(ng-)：驗吟牛；

(3) “喫(吃)”，中古溪母入聲字，老四五六皆讀同清母的“七”，音 ci ω ；老七變回舌

⁴ “不重複資料”指“統計比較項”，這裏指老四左音音節（聲韻配合單位）。餘類推。

根音: ki ω 。

4.6.4 各版本部分右音即俗音的音值有變化，其音節數量倒是比較穩定，變化相對小些。變化大的是左音即正音，不僅總量變化大，其音值也有相當多的變化，例如鹹深二攝字的韻尾收-n 還是收- ω ，宕江二攝陽聲韻有無- ω 介音、入聲字韻尾收- ω 還是收-f，山臻二攝合口韻左音是開是合，等等，絕不只是“標記方式”上的差異。以上兩小節(4.6.2、4.6.3)十項都顯現了“回歸”南方官話正音的趨向。

4.7 雍正訓諭以及隨後華南遍設正音書院，這一算不上成功的中國舉措，對於以培訓嫻習“華語正音”的譯官為己任的朝鮮司譯院，便非同小可了。雍正訓諭(1728)後的17年，即1745年，朝鮮司譯院刊行了兩套諺解《老乞大》：《諺解老乞大》和《舊刊諺解老乞大》，就是我們所謂的老六和老七。這是很不尋常的。又過了15年，即1760年，譯官邊憲隨朝鮮使團到燕京，同中國學者一道，對《老乞大》逐字逐句地討論、修訂，形成了《老乞大新釋》和《老乞大新釋諺解》(1761-1763)。洪啟禧(當時使團首長)《老乞大新釋·序》曰：“我國古置質正官，每歲以辨質華語為任。故東人之於華語，較之他外國，最稱嫻習。”入清以後，朝中關係緊張，“百年之間，茲事廢而譯學遂壞焉……舊時多名譯，周通爽利，聞一知二，不至逕庭。挽(晚)近以來，習俗解弛，濫竽者亦多，殆無以應對於兩國之間。識者憂之。余嘗言：不可不大家釐正。上可之。及庚辰銜命赴燕，遂以命賤臣焉。時，譯士邊憲在行，以善華語名。賤臣請專屬於憲。及至燕館，逐條改證，別其同異，務令適乎時便於俗……今此新釋，以便於通話為主”。他們在燕京，依慣例是跟漢官(當然同時也是學者)合作“辨質華語”、“務令適乎時便於俗”。因此，我們相信《老乞大新釋諺解》的記音是可信的，是反映漢語時音的，而這個“漢語時音”，不是旗人的燕京話，而是漢人的南京話。

4.8 老七亦有《序》曰：“自今以往，中華正音賴是書而大行於吾東，豈曰小補之哉！”和老九一樣，十分注重“正音”。老A雖無序文，但相信也跟老九一樣，是“質正官”“辨質華

語”的成果，是確認“官話正音”回歸南方官話(南京音)的實錄。作為朝鮮時代最重要的譯學教材，《老乞大》六版本韻母系統既有相當高的一致性，前後兩組之間又存在一種陡然變異的“斷裂層”，而這種變異並非“順向”反為“逆向”——正是及時反映了雍正訓諭所造成的中國漢語時音的變化。《老乞大》前三個版本大致反映了官話正音代表點從明代中葉逐漸北移的趨勢，後三個版本則反映了從雍正初年官話正音回歸南方官話(南京音)的趨向，朝鮮六版本諺解《老乞大》記音的價值，正在于如實地反映了近代漢語史上迄今鮮為人知的這一特殊變異過程。

4.9 負責編纂漢語教材的朝鮮司譯院，乃官方常設機構，有一套“質正”制度，有人才輩出的高水準漢學專家，他們對“官話正音”的理解與把握，不帶隨意性，完全尊重中國語言的實際。他們有歷史發展的觀念，因而能夠制定並遵循其“質正制度”，派遣質正官定期到中國向中國文吏調查質詢，一字一句予以校正，所編教材能及時反映漢語的發展演變；《老乞大》不同歷史時期的十餘個版本，並非一個“古本”的傳抄翻刻，而是一個延續四五百年的與時俱進的系列，是中國本土漢語發展演變的真實寫照。到1850年前後，官話正音的代表點已轉移到了北京，英國人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及時地反映了這一變化。1883年朝鮮譯官李應憲所編《華音啟蒙諺解》也反映了這一變化。(張衛東1998C, 2000C)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北京話，內部相當複雜，《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話，跟《華音啟蒙諺解》所反映的燕京話，應該看作是一種互補關係，並非互不相容；這類文獻所反映的“正音”和“俗音”，正處於相互較量的膠著狀態，部分傳統的“正音”不得不逐漸“讓位”於“俗音”，而部分“俗音”又不得不放棄其土俗成分甚或由傳統的“正音”取而代之，這就是“文白異讀”的一段語音史。諺解《老乞大》後三個版本左右音即正俗音的差異度遠高於前三個版本，到《語言自邇集》和《華音啟蒙諺解》這種差異度大大降低，即反映了文化中心的轉移跟正俗音即文白異讀此消彼長複雜微妙的關係。(張衛東2002)

表4.6.1：韻母的變異

	老六	老七	例 字
果攝	a	ai	大(開一)
	a	e	他那阿(開一)
	a	ue	麼
假攝	無例		
遇攝	無例		
蟹攝	ai	iai	捱(開二)
	iei	iai	皆塔街解疥界芥薤械(開二)
	i	iei	例滯(開三)米羝低嚏梯體替蹄弟禮濟齊西洗婿細鷄(開四)
	üi	ui	盃杯背梅每妹(合一)
止攝	i	iei	地你麗梨裏李利離荔飢幾記既欺起器棄氣(開三)季(合三)
	üi	ui	饋(合三)
	üi	i	痞被鞞鞞(開三)
	ü ɿ	i ɿ	柿事師之支脂紙只指至齒施詩屍試時市是侍兒耳二餌(開三)
效攝	iaw	iew	標瓢朝趙小笑照燒少擾橋要搖(開三)貂條遼了料繳(開四)
流攝	無例		
鹹攝	an	am	耽貪男藍暫三柑敢堪酣庵暗(開一)衫(開二)凡犯(合三)
	e ω	a ω	合(開一入)
	ien	iam	鑑嵌餛(開二)
	ien	iem	臉減(開二)尖簽漸閃染檢欠嚴塩(開三)店添念謙嫌(開四)
深攝	in	im	臨林沉尋心針深嬾壬襟今金禁姘吟陰飲淫(開三)
	ün	üm	蓼參(開三)
	iv ω	i ω	入(開三入)
山攝	an	en	幹乾竿簪趕稈稈看漢韓旱汗翰安鞍案按(開一)
	ivien	uen	完丸(合一)
	en	uen	般搬絆半盤伴拌鞞饅蔓瞞滿(合一)
	en	an	攀(開二滂)
	ien	ian	間艱姦揀鏘眼鴈閑限(開二)
	an	oan	蕃番繁飯(合三)
	a ω	oa ω	乏發罰襪(合三入)
臻攝	ün	un	本噴僂門們(合一)分粉糞文問(合三)
宕攝	oang	ang	裝裝粧壯壯(開三)
	e ω	iaf	卻(開三入)
江攝	oang	ang	撞雙(開二)
曾攝	üŋ	üing	朋燈等鐙能層曾(開一)甌(開三)
	ün	üing	肯(開一)
	üŋ	ing	棚(開三)
	ui ω	üi ω	蔔菖(開一入)
梗攝	üŋ	üing	冷爭爭庚更甥生孟(開二)
	ung	uing	橫(合二)
	ai ω	üi ω	脈(開二)
	老六	老七	例 字
梗攝	üi ω	e ω	窄(開二入)
	ivng	iving	兄永(合三)
	ing	iving	營(合三)
通攝	ung	ivng	籠瓏鬆(合一)龍弓芎恐共中重縱從松終衆種充絨(合三)
	u ω	iv ω	竹足宿粥叔束(合三入)

參考文獻

- [1] 邵敬敏. 現代漢語通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2] 李葆嘉. 中國語言文化史.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 [3] 王力. 漢語史稿(上冊). 中華書局, 1980.
- [4] 林東錫. 朝鮮譯學考. (臺北)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論文, 1982.
- [5] 王理嘉. 中文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 (北京) 語

文出版社, 2002.

[6] 何九盈. **中國古代語言學史**. (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5.

[7] 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編. **現代漢語專題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8]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漢語方音字彙** (第二版重排本). 語文出版社, 2003.

[9] 威妥瑪(英)原著. 張衛東譯. **語言自邇集——19世紀中期的北京話**.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10] 張屏生. 清末民初南、北官話的語音比較. (臺灣) **聲韻論叢**, 2002, 第十二輯, 129-14 頁.

[11] 張衛東. 論〈西儒耳目資〉的記音性質. **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1, 224-242 頁.

[12] 張衛東. 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 **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8A, 第 3 期, 73-78 頁.

[13] 張衛東. 北京音何時成為官話標準音. **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8B, 第 4 期, 93-98 頁.

[14] 張衛東. 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8C 第 4 期, 136-144 頁.

[15] 張衛東. 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A 第 3 期, 220-229 頁.

[16] 張衛東. 正音俗音皆時音論辨——以四聲通考和四聲通解之凡例為中心. (韓國中國學研究會) **中國學研究**, 2000B, 第十九輯.

[17] 張衛東. 〈**華音正俗變異**〉考. (韓國中國語學) **國際中國學研究**, 2000C, 第 3 期, 195-216 頁.

[18] 張衛東. 從〈語言自邇集·異讀字音表〉看百年來北京音的演變.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 2002, 第 13 卷第 4 期, 15-23 頁.

[19] 張衛東. 近代漢語語音史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語言科學**, 2003A, 第 2 卷第 2 期, 91-99 頁.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 張衛東. 再論“正音俗音皆時音”——以多版本諺解〈老乞大〉為中心. 韓國雙語學會. **北京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2003, 2003B. 北京外國語大學.

作者簡介: Zhang Weidong (張衛東), Profesor M.A.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P.R.China.

張衛東: 教授, 碩士. 深圳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中國廣東深圳, 518000.